



鲁力著

当今炎黄子孙

武汉大学出版社

序

巴金80寿辰，臧克家作诗贺之，诗云：“四十年前忆旧游，奋将大笔写春秋，躬经坎坷心欲壮，浩荡文坛立阵头。”这是不错的。他的《家》、《春》、《秋》，浓缩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兴衰，堪称《巴氏春秋》。这自然也是效法了孔子修《春秋》的，但笔法却非“一字”褒贬。回想我们的“史”，自孔子修《春秋》以来，许多并非春秋的文字，也动辄冠以“春秋”的，实在太多了。后来出了一位文章改革家，就是司马迁。这位太史公为人谦虚，常言：“刑余之人，何能言勇！”而其实他很勇敢，就连当时的国家元首汉武帝刘彻的愚昧，他也秉笔直书，丝毫的不“为尊者讳”，刘彻的怎样信神信鬼等都一一记之，于是有了130篇铿锵的文字，一部辉煌的著作——《史记》；那用“人宝”换来的辉煌，自然又不同于平常的“辉煌”了！

我等凡夫俗子也想修“春秋”吗？不想。而只想写写平常的人和平常的事，不写帝王将相，也不写才子佳人，写出的又差不多全是凡夫俗子；没有英雄，没有豪杰；小偷、流氓和别的罪犯有几个。我想我们的同类大概情况也就是这样吧，瓜子儿里磕出了臭虱，什么仁(人)都有的。但我只能写我熟悉的人、熟悉的事和我的朋友们。几十年下来，不料竟得了几十篇文章，涉及到上百的人物。但这些人物我也并不全赞成他们，而且也并非都是同志的。该怎么称呼他们？我

接受了一位朋友的意见，一言以蔽之，统称之为“当今炎黄子孙”。说得明白一点，本书里的人物，有好人也有不好的人，因而它不是一本纯粹的《颂歌》，也不是《恶人传》。人们怎么看，看了又怎么想，那是个人的事情，我就管不着了。

鲁迅先生曾把忧国忧民埋头实干的仁人志士们称为民族的“脊梁”，拿这会儿的话，该叫“精英”才对。当今的炎黄子孙们当中有“精英”吗？有的。自然本人不是“精英”，而我的朋友们——我已给他们立了不象“传”的传——大有“精英”在的。

在农村开始改革的时候，中国人的头脑还被一个个“左”的“框框”框得很紧，正如马克思自己说过的“死人抓住了活人”，只能引证过去的理论，而不敢触动理论本身，把现实的一切都要装进“左”的框框，什么也不敢想，什么也不敢干，什么也不敢改。当时流行的说法叫“思想僵化”。在那“僵化”的年代，通城县委书记吴涛却不声不响的开始了包产到户。他搞“农业定编”，为剩余劳力找出路，为山山水水找门路，为农副产品找销路。他发现了茶农“挖茶”，就亲自下去跟踪追击调查原因，他研究了茶叶流通过程中的21个环节，环环“雁过拔毛”，因此“种茶不如种苕，种苕不如长芭茅”，所以就“挖茶”。怎么办？他决定在完成国家茶叶派购任务后，放宽政策，多余的茶叶让农民自己加工自己销售。这就使有些人不高兴，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茶叶风波”！但他们为茶农却争得了几百万元的收入，保护了茶叶生产。我想中国的县委书记们，若是都象吴涛这样的干工作，中国农村岂能总这么落后吗？所以我称他们那个县委班子为“柱石。”

正当贫困滋生腐败，不正之风盛行，打击经济领域犯罪煞不住这股风，整党也没有煞住这股风，可谓“世风日下”时，处在腐败和反腐败最前线的一个劳改单位——沙洋农场管理局，在局党委书记方干城的提倡和带动下创造了一个“党风特区”。方干城以身作则，正己正人。当人们在争那个“五子登科”时，他依然还住在50年代的平房里；社会上走后门成风，管理局每年各单位招工，他没给任何人开过条子和说过私情；他是一把手，带头拒贿，他制定了一条条的制度，一年查几次，发现问题立即处理，对任何人都不姑息的。这里比起别处来，可谓“为政清廉”，象个“党风特区”的样子。于是我又想，不正之风真的就煞不住吗？不，还是事在人为。如果我们所有的党委书记们都象方干城这样的一身正气而又认真去抓，在各自的“领地”创造“党风特区”和“小气候”，全国的不正之风还能逃到哪儿去！

我想到了“人”，于是就想到中国人又多又少。吃饭的人多，争着要吃“大锅饭”、要端“铁饭碗”的人尤其多，而真正有知识会经营会管理的人不是多而是少。所以我们的问题一直是“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能得一将造福一方。原国营五三农场党委书记黄苏民是个难得的人才，他在五三执政三年，在原来的基础上，就把一个“五三”变成了两个“五三”。如果我们的企业都能有黄苏民这样的企业家的创业精神，中国的企业会大改观的，但可惜中国的黄苏民太少了。所以我认为，他是我们的“表率”！

我的这些朋友们自然也不算什么“大人物”的，比较而言，我笔下那芸芸众生的“小人物”们，倒使我一直觉得特别的可亲可敬可爱。熊开元不愿在机关当科长而要在农村干，他有点“怪”，就是这个“怪人”，二三年的功夫，就把

一个长青村盘富了。鲍重阳叔侄四人竟丢了到手的“铁饭碗”，回乡下端起了“泥饭碗”，合资办养鸡场。这在当今的许多中国人看来简直是“疯子”！唐本纲等三个退休干部，有吃有穿却嫌不自在，跑到乡下搞开发农业，有人支持他们，很多人并不理解他们，说他们生成受罪的命！姚光兰，一个女医生，每日穿着白大褂上班，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可她却偏偏还要“下”，毅然脱了白大褂去养牛。她承包了一个奶牛场。她图的啥？很多人都没有猜对。如果说徐耀先不怕吃苦耐劳，背着行李进山去调查研究，攻下了消灭水杉色卷蛾的科研专题，添补了国际空白，那因为小徐正在“风华正茂”之年，“赤旗高举好着鞭”。可那位97岁的“老积极”陈德新也办起了试验田，人们就搞不清他是什么心思了！

我笔下的“小人物”，还有“小”得无法“瞄准”的。“山花”——一位山村姑娘，她来到人间不足30春秋便又匆匆离开了人间；她只留下了一段可怀念的事迹，别的什么也没有留下；大约人们也早就忘记了她的。一位科学家的妻子高慧敏，一位县委书记的妻子许银姑，她们都没有轰轰烈烈的事迹，有的只是平平常常的出工收工，上班下班，丈夫孩子，柴米油盐，洗洗浆浆，烧火做饭，可如果没有她们的默默奉献，我们的科学家和县委书记们就不会有出色的成就。千真万确的真理，一个成功人物的后面，都不免站着一位勇于牺牲的女性！男人们怎么也不应该忘记了她们。

现在的年轻人们不大了解50年代的人。现在有什么“信仰危机”，50年代包括后来的“三年困难时期”没有这种现象，因此有《刘家父子》这样的人和《战天记》里讲到的故事，就不足为奇了。刘副社长——中国最小的官，竹山县山

区的普通农民，可那时候如他这样的农民们想的却是人民富裕国家富强；正是因为当时人们的精神力量维护了国家经济的发展，但也掩盖了极左政策和僵化体制的弊端。我想，如果我们的改革改正了过去的错误以后，还能保留50年代人们的那种精神和风格，特别是那人人奋发的精神，我们的事业就如虎添翼了。但可惜，“刘副社长”们已经老了。我常常梦想着往事，这往事虽已是历史了，我倒希望那历史能“重演”的好。

我不想看到炎黄子孙们有愧对祖宗的地方，但这又难免。在《人和人》、《感化》等篇，我写了战斗在“两劳”战线的干警们，写了作恶的囚徒们。罪犯们是一些害群之马，放在社会上他们会继续害人，所以要把他们关起来劳动改造。但我相信，正义和道德的力量会使一切不愿堕落下去的人变好。人们对于自己的同类实行“专政”，应当限于不得已而为之。

回忆起来，我们这一代的炎黄子孙们，是极聪明也极不聪明，极不平凡也极平凡。我们经历过“火”的洗礼的年月，经历过蒸蒸日上的年月，经历过碰壁挫折的年月，经历过探索前进的年月。我们得意过，痛苦过，困惑过。在和拿枪的敌人拼杀的时候，倒是一切谨慎从事，胜利了，有人就有些飘飘然，得意忘形。这使我想起了唐人柳宗元的《敌戒》：“皆知敌之仇，而不知为益之尤；皆知敌之害，而不知为利之大。……敌存灭祸，敌去召过。”革命胜利了，我们就有些不谨慎了，累有“失误”，以致做过错事，受过挫折。挫折使我们困惑过，痛苦过。50年代的后期，在我们的国家到处垒起了大锅灶，吃起了“大锅饭”，那时的口号是，“吃饭不要钱，人人肚儿圆！”敞开肚皮吃饭。吃了还

不到一年，就吃空了吃穷了，接着便来了“三年困难”，喝稀饭，饿肚子，许多人得了肝炎、浮肿病。那是个悲剧的年月，它给炎黄子孙们带来的是灾难。这些年，我们一直在肃清“大锅饭”的影响，而它的幽灵却至今还在缠着某些人们的头脑，有的人还是想吃“大锅饭”。我不愿意肯定那一段的历史，但根据“历史无空白，现实无禁区”的理论，却无权让那段历史“空”着。因此，本书收录了所谓“十七年”的部分作品。因我觉得虽处在那样极左的荒唐的年月，炎黄子孙们仍不乏闪光的人物创造了种种闪光的业绩，是他们代表了时代的精神。如《姑娘王》，是今天的人无法理解的，就象至今我们都难以理解魏晋人的“吃药癖”。但在当时，他们的事迹却轰动了光武皇帝陛下蒙难过的五里桥，在襄阳府和北京城也轰动一时。他们的事业得到了社会的肯定。我当时是以肯定的观点采写了这些人物，现在来看，我在这一点上错误还不是主要的，再读我那些笔下的人物，还是那样光彩夺目，即使到了90年代，他们的精神仍值得人们效法！

那么10年“文革”时期怎么又是“空白”，难道10年就没有写点什么吗？写了的。但想起那会儿的“写”，不免先要在心里流泪了！我是当年那篇《政治要落实到业务上》社论的作者。我的很不好的毛病，就是“为文”不愿意跟谁对号，我的观点跟那位“不用轻骑追，烈火自焚烧”的大人物，大约有那么一点不太合，于是便有人瞧出了我的那文章的“反动”来；又于是“顺藤摸瓜”，翻箱倒柜，把我的“十七年”的杂文，分别判为“黑货”和“毒箭”！连《关心群众的眼皮》，也成了“大毒草，”批得“狗血淋头”！而我便也成了中国“赫鲁晓夫”“反革命”路线的鼓吹者，给“揪”了出来，名字也倒了写，需有杂技演员的功夫，头朝

下而眼不花，才识得那是自己的名字。从此，我就得“写”了，天天要“写”。有时是关起来“写”，几个人看着的；有时是劳动兼“写”，或“写”了劳动，或劳动完了“写”。10年积累，我“写”的东西不下10公斤（无法用页码计）。因为在“同学”中放个屁未经批准，就要被怀疑为“通风报信”，“攻守同盟”，就得“写”清楚。现在听起来谁也不会相信的，但在那荒唐的年月真有其事。还有“天天读”，如我辈是不配读“老三篇”的，只可以读《孰促杜聿明等投降书》、读《南京政府向何处去？》。读了就得“写”。

“写”什么？写投降不投降，写“向何处去”！所以就要“天天写”。我那10年的“作品”，若要拿来出书，足可出20个专集。但那全是“交待”呀，它只可以放进博物馆，给后人们增添一点笑料；若要出书，却要把世人弄胡涂的。所以这10年就只好“空”着。我觉着“空”着也好。历史给我们开了个大玩笑，我的书便只好开个大“天窗”，让人们自己看，自己想！

春去秋来，大江东去，不可逆转，不管有怎样的挫折、不幸和灾难，炎黄子孙们照样要前进，照样在前进！我只是把我们时代正在前进着的芸芸众生们是怎样的一群，写出而已！

1990年1月

目 录

序

柱 石

- | | |
|---------------------|--------|
| 1. 熊开元创业记..... | (1) |
| 2. 别了, 铁饭碗! | (6) |
| 3. 柱石 | |
| ——中共通城县委创业纪实..... | (10) |
| 4. 三个布尔什维克..... | (23) |
| 5. 陈发亮放旱鸭的故事..... | (29) |
| 6. 出山..... | (32) |
| 7. 竟陵镇..... | (36) |
| 8. 老积极..... | (40) |
| 9. 泥巴腿子“唱大戏”..... | (43) |
| 10. 李大方和“串连农业”..... | (45) |

正 气

- | | |
|----------------------|--------|
| 11. 正气歌..... | (50) |
| 12. 人和人 | |
| ——武汉监狱见闻录..... | (55) |
| 13. 方江青办案..... | (78) |
| 14. 感化 | |
| ——沙洋劳改农场改造犯人二三事..... | (83) |
| 15. 生力军 | |

——活跃在官坪的后生们	(89)
16. 亲人	(96)
17. 大管家	(101)
18. 高庙人一日记	(107)

表 率

19. 丹心照汗青	
——新滩岩崩滑坡救灾中的共产党员们	(111)
20. 表率	
——记国营五三农场党委书记黄苏民	(116)
21. 贾文斌评传	(124)
22. 忠肝义胆不可壮 要为人间留好样	
——鄂西人物述林	(138)
23. 我们生活中的“牛百岁”	(143)
24. 以权谋公的人	(150)
25. 刘家父子	(153)

战 天

26. 王先知治水	(160)
27. 战天记	(166)
28. 巧手丹心绘新天	
——潘家场人建设“河网化”追记	(174)
29. 伏草的人们	(183)
30. 丁俊麟和鄂沙28	(186)
31. 徐耀先智灭色卷蛾	(189)
32. 开创绿色事业的人	(197)
33. 值得一书的凡人凡事	(201)

34. 郭光树和“万亩茶园”	(204)
35. 广阔天地众生奔富	(207)
36. 白龙腾飞记	(212)

红 漱

37. 一代红妆	
——女强人姚光兰的故事	(215)
38. 她和他的正交设计	(226)
39. 她，把爱献给了母亲们！	(239)
40. 吴清安的罗曼史	(242)
41. 吴安秀探亲	(247)
42. 许银姑小传	(249)
43. 姑娘王	(254)
44. 山花	(259)

革 新

45. 浩荡农门立阵头	
——吴运涛和李店的改革	(263)
46. 武昌人和武昌鱼	(272)
47. 油漆匠代勇外传	(275)
48. 访朱湖渔民和渔协	(279)
49. 军风颂	(283)
50. 八潭人创丰年史稿	(290)
51. 当今中国最小的官	(296)

三 兴

52. 山里人的“三兴”	(302)
--------------	-------

- 53. 赵李桥“吃山”之歌..... (309)
- 54. 黄沙的报告..... (313)
- 55. 石头记..... (316)

神 水

- 56. 神水..... (319)
- 57. 天红龙宫记..... (323)
- 58. 天堂游记..... (327)

1. 熊开元创业记

“……也不是那个话。我们是形势所逼，基本规律所逼，逼着我们朝前走。一人几分地，盘成金子也富不了。不走‘稳住农业，发展工业’的路，就没有路。

“有人说我跟潮流不合拍，有这么一点，我们‘老三届’一起毕业的47个同学，走了46个，我就要守在农村，不走。有个单位要我去当副科长，我说算了吧！那有什么意思，要干自己干么。不去。

“1980年有的汽车修配行业下马，我是那时候上马的。我这人就喜欢‘逆境而上’。

“我们的汽修厂，现在能修国产各类轻便汽车。今年6月开始研究总装汽车，成功了，货很俏。明年3月开始，脑壳、大梁都是我们自己生产，拿出自己造的‘长江牌’汽车……”熊开元如是说。

熊开元是武汉市长青村的党支部书记。长青村225户，过去是“人人都种田，户户小而全”。现在是10户务农，215户务工，农业收入只占总收入的3%，工业占97%，农村变成了工业村。熊开元28岁当大队党支部书记，几年工夫，硬是把一个穷地方，变成了富裕繁荣的新农村。

在村办公室，熊开元向我们介绍情况。他是一个思想清晰，精明能干，而又善于言辞的小伙子。他挽起袖子，一面讲一面做着手势。他从农业的“分离”讲到工业的管理，从抓生产讲到抓经营，抓信息，自造汽车。头头是道，事事在

握，心怀全局，胸有成竹。他今年33岁，干了5年村支部书记，这个村就翻了五番。算了一下细帐，实实在在地一年翻了一番。

这儿农业已全部实现了专业化，10户专业户包了。全村380头生猪派购任务，就4户人家包了。大头是工业。熊开元领我们看了他们的化工厂、纸盒厂、服装厂、木工厂、篷垫厂，最后把我们领进了汽修厂。啊，这儿可真是汽车的世界，一千多平方米的厂房，挨个儿摆满了各种汽车，叮叮榔榔、丝丝沙沙，工人们（不，应该是农民们）忙个不停，有的正在修车，有的正在安装，有的正在喷漆——电焊枪时时放出“火树银花”。摄影师来了，说要照像，给汽车照像，厂房里便开出了一辆他们自己总装的新汽车。看，那外形多美，漆光放亮，可照见人影；车内装璜优雅宜人，后面的活动座位，还可折起带货。一车多用，是理想的轻便旅行车。他们暂取名“213”。农民敢造汽车，农村造出了汽车，同志，你怎么想？

熊开元谈了他的经历，他怎样创业。那是1979年，长青村简直下到了“锅底”。以五小队为例，那年一个工分值只8分7厘，“买根油条没有喝豆浆的钱”，全生产队家家超支。干部不想干，农民都在钻路子进城当工人，都没有心思务农。那会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开过了，有的人还没看清形势，28岁的熊开元，要说有比人聪明的地方，这就是他的聪明处，他看到了形势，对未来充满希望。但要他当支书，压这么重的担子，他又有点信心不足了。好在有人给他撑腰。两个上年纪的大队干部对他说：“开元，群众拥护，你就大胆干吧。我们给你助威，再搞不好，我们集体辞职。”老干部的支持给他增添了力量，也增强了信心，他走马上

任，当了支部书记。

熊开元上任后，先要看看大队还有多少钱。办事总得要几个钱。“无钱难死英雄汉”。他把大队收支帐算了又算，不觉心里一寒！原来1979年满打满算，全大队收入除去开支，还剩了200块钱。就指望这200块钱创天下，笑话吗？但熊开元没有因为只有200元活动资金的家当被难住，他的思想超出了“看菜吃饭”的常规，没有钱想没有钱的办法。熊开元早就想过，长青村光靠搞农业，一千年也富不起来。必须保住“皇帝”（蔬菜），发挥优势，发展工副业。而且也只有发展工副业，才能把劳动力“拴住”。他四处奔走，想办法找路子，想办法集资，因陋就简，穷事穷办。1980年他办起了两个小厂。一个纸盒厂，投资不大，现做现卖，转眼见效。一个化工厂，设备简单，来得快。嘿，别看这两个小厂，当时却解决了大问题。49个劳力就业问题解决了：半年时间还赚了一万多元。熊开元很高兴，尝到了油水，心更大了。下半年开始“母鸡下蛋”，筹办皮件厂和汽修厂。

熊开元从农业上抽出了五个劳力筹办汽修厂。这是队办企业，队里自然要投资。投多少？你听了也许会笑掉牙。熊开元大大方方，给了他们100元钱。五个人哭笑不得！好大的钱，100元就想办个汽车修配厂？天下奇闻！他们又去找熊开元，熊开元还是那句话抵死：“我只有100元。”想多一分也没有。但哭是哭笑是笑，事情还得办。他们拿这100元钱，数着用，用着数。买了几把锤子和几样必用的工具，别的都不敢买。就这样，五个人开进两间破房子，叮叮当当，汽修厂就算开张了。

五个人谁修过汽车？谁也没修过汽车。现在想来，简直有点象“神话”。他们有人到国营汽修厂看过，看人家敲敲

打打，就能赚大钱，没想到碰着技术活么办。没客上门，咋办？得自己出去找活干。一天，他们听到说航空路××三局的车给撞坏了，瘫在那儿不能动，没有人接受修。熊开元叫他们去人把这个活“拣过来”。他们找到了车主，讲好了条件，活接回来了。叮叮当当就开始动手修。该修的地方都修好了，可就是开不动。怎么办？熊开元跟他们一起想办法，嘿，可真想出了一个好办法。他们通过人托人的关系，在国营汽修厂请来了两位老师傅，看是啥毛病。老师傅很快找出了毛病，顺利地修好了。但一算帐，要命，修这辆车，倒赔了一幅子。赔了还干不干？熊开元很坚决，还要干。这时，他用了个小计谋。他暗暗从农业上抽出了几个曾学过开拖拉机的小伙子，叫他们到汽修厂向请来的老师傅学习。限令3个月。这几个小伙子都有点“鬼心眼”，3个月不到，就能学的单独干了。这一下，汽修厂“腰杆”硬了，国营厂能拣的大活，他们也敢拣。1981年，这个100元垫底起家的汽修厂，就净赚了30万元。他们越干劲越大，继续“滚雪球”似的朝前滚。现在，这个厂已“滚”到98人，今年计划产值220万元，占全村总收入的三分之一。

“滚雪球”是熊开元的拿手戏，“是个穷办法，也是个好办法”。他要每个企业都要有“滚”的精神。各企业也的确“滚”得很快。现在的篷垫厂，前身只有6个人、6部缝纫机的皮件厂，越滚越大，现在已发展到89人，1000多平方米的厂房，拥有各样自动和半自动的设备；去年产值达到178万元，今年计划达到270万元。1980年开办的服装厂，6个人起家，现在发展到60人，年产值80万元。农业也是“滚雪球”；小农“滚”成大户。熊开元的办法是，工业补农业，重奖大户，鼓励多种田，这样，200多户经营的土地，

逐步集中到了10户“种田精”的手里，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和商品率大提高。熊开元说，从明年起，工业拿钱，采用喷灌等先进技术，使农劳产值赶上工劳产值。长青村的经济就是这样“滚雪球”滚起来的。

1984年10月